湘江头条

南岳投龙简：唐玄宗投下的『生日愿望卡』

常野

10月28日，一场名为“遵道而行——南岳衡山石刻拓片档案”的专题展正式启幕。其中，一张北宋年间水帘洞的摩崖拓片引我关注。

石刻内容是：

羽客下棋处，金龙曳尾处，宝篆浮水处，投金龙玉简处。宋政和丁酉七年六月，仪真李亘通微书圣迹。

它明确记录了1288年前唐代在南岳“投金龙玉简”事件与精准的投龙地点。这枚寄托着祈愿的唐代投龙简，在水下沉没千年后，在清道光年间惊现于世。从此引发学界持续的关注，一直到今天，它仍是研究古代政治仪式与宗教地理的重要文物。而它自身，也经历了从衡山到长沙，再到南京、安顺的一路辗转流离，最后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唐玄宗“生日愿望卡”的漂流

2024年9月20日，衡阳市博物馆“湘见万年”特展的展厅里，迎来了一件从贵州借来的展品——南岳投龙简。这是南岳投龙简在离开故地近两百年后第一次“回家”。可惜我因故无缘得见。同年12月，我在浙江省博物馆“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中终于见到了它。它被安放在一个醒目的独立展柜中。虽有锈蚀却仍光彩熠熠。

这枚铜简的铭文，是一封格式完整的“通神信笺”。正面先报自家身份：“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诞。”接着陈述信仰与诉求：“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然后是投放地点与理由：“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盖仙洞。位忝君临，不获朝拜。”最后交代传递方式：“谨令道士孙智凉，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背面三行五十一字，记录执行团队：内使张奉国“本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处道，判官王越宾“壬寅八月七日”，傔人秦延恩。

简文字数不多，诉求清晰：53岁的李隆基，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这枚铜简为何能够受到如此的重视？

因为目前存世的帝王投龙简很少。其中最有名的有两枚：一个是武则天投于中岳嵩山的除罪金简，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另一枚就是这枚唐玄宗投龙铜简。它因此成为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枚铜简的命运也堪称一段传奇。

在它被投入南岳深潭之后，关于这件事，直到北宋仍有记载。北宋道士陈田夫在《南岳总胜集》里提到：“自中潭下入谷十有八仞，有冥蟠壁，面阔四席，涛雪腾飞，雷雨骤下。虽天台峨眉不及此势也。下有投龙潭，国家修醮毕，投金龙於此。”除此之外，更有力的证据便是南岳水帘洞景区的那方北宋摩崖石刻。文献与文物，同时证实着这段历史记忆。

然而，历史的动荡几乎湮没了这件盛事。自宋之后，关于南岳投龙的信息开始变得迷离起来。直到清道光年间，投龙简竟又神奇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有人在南岳水帘洞下的投龙潭中将这枚铜简淘出。清代金石研究风气极盛，投龙简上刻写的文字内容很快就传遍了文化圈。



衡阳市南岳衡山水帘洞景区。 曹正平 文兰 摄（湖南图片库）

但它从此就开始了“漂流”。投龙简最先是归为易大令所得，后被长沙唐荫云收藏，晚清金石学家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抄录了简文。此后它便神秘地消失在民间，然后在近代辗转流入南京古物保存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铜简随故宫文物一并装箱。1939年，它随八十箱文物存入贵州安顺华严洞，一存近六年。1944年冬，故宫文物迁川，铜简移交安顺民众教育馆；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建，它从安顺拨交入馆，就这样留在了贵州。20世纪90年代，学者王育成无意间于贵州省博物馆铜器类文物里重新发现了这枚铜简，投龙简从此重新绽放光芒。

我与南岳投龙简的第二次相见，正是在贵州省博物馆。它是常设大展的重要文物，享受独立展柜，观赏人群络绎不绝。

投龙：皇权与山川神灵之间的沟通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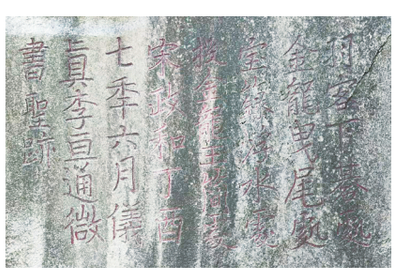
投龙，本质上是一个“皇权神授”的政治化仪式。

投龙简的用途，是把人间的文书传递模式投射到神界。简是奏表，龙是送信使者，“收信人”是山川神灵。山简奏天官，土简告地官，水简投水官，玄宗这枚“投刺紫盖仙洞”的铜简属于山简，对应天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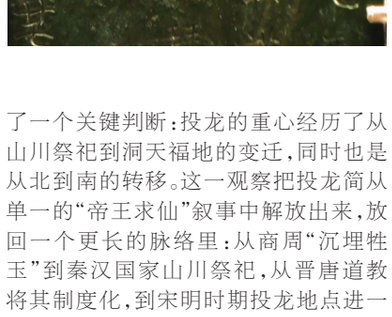
这封信并不是谁都能写的。投龙在唐代是官方仪式，绝大多数活动由朝廷“奉旨实行”或地方官府组织。玄宗朝为规范这套仪式，对简的材质、铭文格式、斋醮流程、投放地点设定了官方定例。投龙仪式所投送的不仅仅是金龙、玉简，尚有玉璧和金钮。这些信物被缠以青丝，一并投到名山洞府中，作为升度之信，奏告天、地、水三元。因此，该仪式又称投龙简、投龙璧等。这些信物各有寓意，质地亦不局限于金玉。每次投龙，用龙、简、璧各一件，金钮九枚。龙，用金或铜做若龙形，负责将写有告文的简送抵三官府。南岳投龙铜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这套制度化仪式留下的可以直接触摸的实物。

投龙这件事真正进入现代学术视野，是从沙畹开始的。1919年，这位法国汉学家出版遗作《投龙》，将这一“冷僻的中国道教仪式”带入西方汉学的视野。沙畹的探索从国家层面的山川祭祀转向了道教对这项传统的吸收与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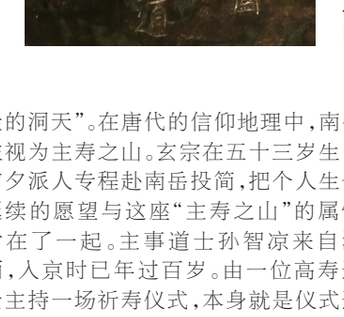
学者李零说，“沙畹只是开了个头，我们可以接着讲”。2024年浙博特展“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是对这个“没有讲完的故事”的接续。李零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投龙的重心经历了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变迁，同时也是从北到南的转移。这一观察把投龙简从单一的“帝王求仙”叙事中解放出来，放回一个更长的脉络里：从商周“沉埋牲玉”到秦汉国家山川祭祀，从晋唐道教将其制度化，到宋明时期投龙地点进一步集中于南方洞天福地。



南岳“投金龙玉简”摩崖石刻。 作者供图



南岳投龙简（正面）。 作者供图



南岳投龙简（背面）。 作者供图

玄宗投向南岳的这枚铜简，恰好处于这条变迁线的关键节点上。它既是国家祭祀级别的帝王行为，又明确指向一个道教洞天体系中的地理坐标“紫盖仙洞”。

南岳水帘洞：一个古代政治地理学里的圣地

唐玄宗为什么选择在南岳水帘洞投龙？

学者汲喆曾归纳沙畹的核心思想是：“将宗教名山和仪轨纳入政治史的脉络，追究的是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古代中国的圣地政治学”。在南岳，这个圣地就是紫盖仙洞，也就是今天南岳风景名胜区的水帘洞。

2019年在南岳寻访国保时，我曾见到水帘洞摩崖石刻遍野的壮丽景观。显而易见的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的地位远比现在更高。

玄宗为什么把祈寿的信寄到南岳？铭文里的“紫盖仙洞”就是答案。司马承祯在《天地宫府图》中将南岳衡山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三位。

但南岳之于投龙，不止是一处“灵验的洞天”。在唐代的信仰地理中，南岳被视为主寿之山。玄宗在五十三岁生日前夕派人专程赴南岳投简，把个人生命延续的愿望与这座“主寿之山”的属性对在了一起。主事道士孙智凉来自江西，入京时已年过百岁。由一位高寿道士主持一场祈寿仪式，本身就是仪式逻辑的一部分。孙智凉还曾往吉州玉笥山、抚州华盖山为玄宗投龙，说明玄宗朝的投龙是一套持续运作的制度，而非孤立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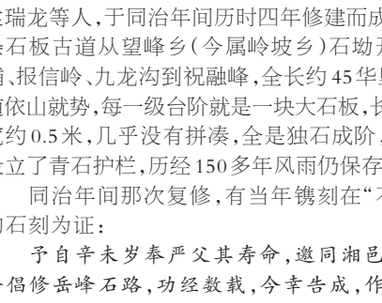
水帘洞的“洞天”身份，在本地信仰中还有一层更古老的根基。古籍载此地为朱陵大帝（炎帝）所居，故也称“朱陵洞天”，全称“朱陵太虚小有之天”。这一渊源使它在道教洞天体系中不仅是一个抽象品阶，更附着了具体的神话记忆。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沈绅在水帘洞瀑布下题刻“朱陵洞天”四字。百余年后，朱熹与张栻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来游，朱熹留下“酒醒朱陵洞里天”的诗句，又将这座洞天从祭祀空间延伸为士人精神漫游的文化世界。

玄宗活了78岁，他祈求的“长生”没有实现。但投龙的传统远比他个人的寿命长得多。唐亡以后，吴越国在西湖频繁投龙，四位国王的银简在20世纪50年代西湖清淤时相继出水；北宋将投龙重新纳入国家礼仪；金、元、明延续，直至清代才退出官方舞台。从先秦到明代，这条漫长的脉络，展现着皇权政治与山川神灵信仰间一种持久而复杂的关系。

曾国藩古道不是曾国藩所修

廖和平



古道石碑。 通讯员 摄

这是一条香火不绝的心愿之道。

在古代，它的重要地位远非今日可比。它是南岳后山和湘乡、双峰、湘潭，乃至长沙一带信众登祝融峰朝圣的捷径，长年香歌不断，行人络绎不绝。古道上的报信岭、五岳殿、半山亭、礼佛亭等设施，配置与前山登峰主道大体等同。从坐标上看，祝融峰实际上是坐落于后山，人们常说：“从后山古道登峰朝圣是烧顺香，从前山上是烧倒香”。

自唐宋以来，万千信众年年循此古道礼岳朝宗。古道沿线庙宇连绵，亭台相望，曲云庙、关圣殿、五岳殿依次矗立，每五里路配置一个茶亭，供赶路的香客静心祈福、暂歇疲惫。

这条承载万千信仰的朝圣古道，曾多次得到修缮，但全程铺上清一色的麻石板，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事了。

人们普遍认为，古道是曾国藩兄弟修建的，所以叫“曾国藩古道”。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衡阳市人民政府刊立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碑石上就说：“清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出资修缮，故俗称‘曾大人路’。”

曾国藩古道，果真是曾国藩修的吗？

事实上，这条古道是衡山乡贤廖献廷和彭嘉会、袁瑞龙等人，于同治年间历时四年修建而成。当年，这条石板古道从望峰乡（今属岭坡乡）石坳开始，经横铺、报信岭、九龙沟到祝融峰，全长约45华里。石板古道依山就势，每一级台阶就是一块大石板，长约1.3米，宽约0.5米，几乎没有拼凑，全是独石成阶，险要处还设立了青石护栏，历经150多年风雨仍保存完整。

同治年间那次复修，有当年镌刻在“不语岩”下的石刻为证：

予自辛未岁奉严父其寿命，邀同湘邑义士彭嘉会倡修岳峰石路，功经数载，今幸告成，作七律以记其事云：

祝融谁道路难行，直上青云第一程。
宰相芋分千古仰，状元松种万年荣。
放开眼界观风景，好养心田对日盟。
敢谓督修矜伟抱，相偕诸友话生平。

款署：

倡修司事檇披廖献廷撰，湘乡监修浚明袁瑞龙书。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孟秋月上浣谷旦。

刻石内容大意为：同治十年（1871年），衡山人廖献廷奉父亲之命，邀同乡彭嘉会，湘乡人袁瑞龙等，倡捐修建，历时四载，于光绪元年（1875年）竣工。大功告成之日，倡修者心情澎湃，赋七律一首记其事，勒石为记。

全诗没有夸耀自身功绩，满是湖湘乡贤的谦抑赤诚。开篇慨叹往昔登祝融峰行路之艰，而今石板铺就，化为通往云巅圣境的坦途；颔联追慕古贤德泽，期许此番修路善举，亦能如先贤往事，千古流传；颈联寄语往来行旅，行于青石山道，放开眼界览岳中胜景，涵养本心，与日月天地相守；末联尤为谦逊，不以督修大道而自矜，只愿与一众同心协力的乡友，于名山之下闲话平生。

曾国藩逝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是廖献廷等动工修路的第二年。如果曾国藩或其弟曾国荃参与其事，以朝廷重臣的身份，谁敢不在石刻上重点体现？这样来看，曾国藩或曾国荃是没有参与这段古道建设的。况且，他的母亲江太夫人早在1852年就去世了，所谓“为母修路”只是个美丽传说。

事实上，在古道重修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来没有人将其与曾国藩一家扯上关系。1996年出版的《南岳志》，称这条古道为“鲫鱼背石径”（如在鲫鱼的背上行走）。称之为“曾国藩古道”，只是本世纪的事。

不过，曾国藩兄弟及其父辈、乡里们，多次行走在这条朝圣路上，称之为“曾国藩古道”，亦未尝不可。其一，少年曾国藩数次陪同父母，从荷叶塘启程，踏上朝圣古道奔赴祝融峰。他亲眼目睹山路崎岖难行，长辈长途跋涉历尽劳苦。其二，曾氏捐巨资修缮上封寺、方广寺和南岳大庙等。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曾国藩受胡安国之后人胡咸臧之托，撰写了《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有“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之句。1871年，他还题写了“祝融峰”匾牌。

娄底市曾国藩研究会研究称，曾氏族人的确参与到这条朝圣古道湘乡双峰段的修建工程。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潢率侄曾纪泽捐修了其中的全福桥；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荃捐修了其中的积福桥；光绪八年（1882年），曾国荃捐修了从衡山石地方至黄龙坝的石板路。

“历井扪参上祝融，半空烟霭数声钟”（宋柴元彪语）。这条朝圣古道，正是巍巍衡岳最生动、最厚重、最鲜活的立体史书。



衡山曾国藩古道。 袁丽红 摄（湖南图片库）

岳麓书院的两位衡山籍山长

刘明新

南岳衡山钟灵毓秀，洙泗儒风辗转南播，滋养了一代代笃学力行的湖湘士子。清乾隆年间，两位衡山籍大儒旷敏本、欧阳正焕相继执掌岳麓书院。他们接续传承朱张会讲以来“传道济民”的办学旨趣，订立学规、撰作箴铭、题写联语，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旷敏本（1700—1784），字鲁之，衡山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仕途可期之时，他托疾归乡，沉潜经史，深耕地方教化。乾隆十九年（1754年），受聘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掌教三载，他不以科举时文为追求，始终把品格涵养摆在育人首位，在前人基础上订立《六有箴》，倡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在他看来，修身绝非一时一事的砥砺，而要落实到言语举止、昼夜须臾之间，于细微处省察，在日常中打磨。

书院讲堂流传至今的六十六字名联，正是旷敏本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上联向内修心，坚守内心价值标尺，不为外界褒贬得失所扰，涵养通达开阔的胸襟；下联向外担当，以报国报恩、安济民生、传承道统为己任。一内一外，修己济世相辅相成，完整呈现出传统士大夫安身立命的价值追求。

继旷敏本之后，同乡欧阳正焕接过教鞭。欧阳正焕（1709—1760），湖南乡试解元、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为官清正严明、务实干练，深谙世道治理。

如果说旷敏本的思想开阔弘通，重在本心体悟与格局境界，欧阳正焕则更讲求主敬克己、笃实躬行。他手书“整齐严肃”四字训示诸生，并作箴诗反复阐发，将“主敬”视作治学修身的根本。主张肃整身心、约束言行，即便独处暗室，亦不弛怠一念，把道德戒律转化为日用行止的自觉。履职期间，他修葺自卑亭、贾太傅祠，善用碑刻建筑承载教化功能，反对虚浮放旷的学风，力倡脚踏实地、严以律己。“整齐严肃”碑刻留存讲堂，与旷敏本长联、《六有箴》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岳麓书院重要的精神坐标。

旷敏本、欧阳正焕，同乡同世，先后掌教同一座千年书院。他们的理学一脉相承，修身路径各有侧重，形成思想互补。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坚守湖湘理学“明体达用”的底色，力戒空疏义理之学，坚持读书先立德。身处科举兴盛的时代，他们拒绝将书院蜕化为博取功名的功利场域，恪守传道济民的初心，既研经绎义，更重道德践履，主张学问不能困于书卷，必须见诸立身行事。两人皆情系桑梓，留心乡邦文献，致力乡土教化，把书院育人理想辐射民间社会，彰显湖湘士人家国与乡土同怀的精神特质。

他们的思想差异，恰恰又构成修身成事的完整逻辑链条。旷敏本重在明心拓境，着力涵养内在格局。“是非审之于己”，贵在确立独立清醒的价值判断，守得住本心，看得开毁誉得失，养成从容旷达的精神气象，登高望远，体悟大道。欧阳正焕重在主敬持守，着力强化规矩约束。“整齐严肃”，贵在克己慎独，收敛身心，不放逸、不懈怠。简言之，旷敏本回答“当树立怎样的格局志向”；欧阳正焕解答“日常如何守住初心本色”。格局缺少规矩，容易流于空泛虚浮；规矩离开格局，容易陷于拘谨琐细。两者辩证统一：心中存丘壑，行止守矩度，胸怀济世之志，立足实干笃行，这便是传统理学留给后世的修身智慧。

今天回望旷敏本、欧阳正焕，重在萃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养分。旷敏本“是非审之于己”的自省精神，对新时代立德修身颇有启示。置身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我们尤需保持向内审视的自觉，筑牢理想信念的精神标尺，理性看待褒贬非议、成败得失，涵养沉静淡泊的心境，坚守原则底线，不为浮躁风气裹挟。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的持敬理念，则提醒我们作风建设贵在慎微慎独。小事小节映照品行，纪律规矩贵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修养不靠一时激昂，贵在朝暮坚持、点滴精进，把功夫做在平常。

传承乡贤文脉，既要悉心守护遗存根脉，更重在活化古贤精神，做好保护、研究、传播、赋能四篇文章，让沉睡于典籍碑刻间的历史文脉，流淌为湖南大地鲜活的时代力量。